

在闽南，有这样一束“光谱”

□潘凯雄

《时代荣光》中的主要人物几乎都是历史上的真实存在。因此，对这些真实的历史人物，无论是已经逝去或依然健在者，如何在虚构文体中进行二度塑造，自然就成为我们考量这部作品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关注点。虚构大了有悖历史的客观真实，全然写实又白白浪费了虚构文体所赋予的特定自由，因此，个中尺度分寸的把握，既是对作者能力的一种检试，也是这部作品能否成功的重要依据。全书读下来，我对这一环节的个人感觉是，忠诚度有余而自由度略显拘谨。所谓忠诚度有余，指的是其作品将多个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置于“时代荣光”这一共同的时空之中呈现，因而不可能平均分配笔墨，出现详略的差异与取舍十分正常，但无论是详还是略，除去语言与对话我不敢轻易下结论外，其他诸如这些历史人物“出境”的时间、场景和作为等都完全是历史真实的今日重现，合理的想象与铺陈就比较少。如此处理的长处当然就在于穿越时空隧道，重现昔日场景，还原历史真实，这当然见出作者为这部作品的创作所下的功夫，也是十分有价值 and 可贵的。所谓自由度略显拘谨则指的是，既然是小说，那么即便是处理真实的历史人物，适度而合理的想象与铺陈其实是完全允许与必要的，如果运用得体，合逻辑地展开一些铺陈与想象，就会使得这些真实历史人物形象在某些局

故土情、强国梦与红色基因

□张陵

作家王永盛的新作《时代荣光——闽南红色风华录》聚焦华侨史上最艰难的岁月，也是最具荣光的年代，讲述了以陈嘉庚、庄希泉为代表的福建闽南籍进步侨领的真实故事，表现了一代华侨的乡土意识、家国情怀和革命精神，清晰梳理了东南亚地区闽南籍华侨的艰苦创业，心系故土，振兴闽南，参与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历史线索，深刻揭示了华侨的历史与中国近现代革命史的血脉关系，从而热情讴歌广大华侨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做出的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提炼了作品深刻的思想主题。

陈嘉庚先生是一面华侨的旗帜，也是闽南华侨史的灵魂。《时代荣光——闽南红色风华录》抓住了这个重点，展开了他奋进开拓的人生，爱乡爱国的人生，教育救国的人生，民族脊梁的人生，写出了他从一个海外成功的实业家转变为一个爱国者、教育家，中国革命的同路人的必然过程，生动塑造出一个有血有肉的南洋爱国侨领形象。青年时代，他在新加坡接过父亲的产业，靠着自己的商业才能和良好的信誉，抓住了难得的机遇，发展为当地著名的企业家，也成为华侨界的重要人物。在与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等仁人志士的接触交往中，他参与了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并组织华侨资助孙中山先生推翻清王朝的伟大斗争，自己的橡胶园也收留了一大批来自新加坡的起义军。他积极践行自己多年坚持的“教育救国”的理想。为培养中国自己的人才，实现强国梦，陈嘉庚先生倾其所有，创办起厦门大学。要知道，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教育救国”道路曲折而艰难，但陈先生意志坚定，团结起各方力量，突破一个又一个难关，筹集到资金，完成了在别人看来根本无法实现的教育大事。从此，他的闽南故乡有了第一所面向世界的、向世界第一流大学看齐的高等教育学府，把闽南教育事业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抗日战争爆发，陈嘉庚先生通过自己在侨界的巨大影响力，积极筹集大批资金和物资，送往抗日前线，支持中华民族的解放斗争。在延安，他结识了中国共产党人，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浴血奋战，英勇斗争。在比较了国统区见闻之后，他深刻认识到，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他满怀热情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人中流砥柱的作用，找到中国革命的方向，成为中国共产党坚定的同路人。应该说，作品精准地把握陈嘉庚先生的精神品格，形象的塑造是成功的。

另外一位闽南籍侨领庄希泉形象塑造也真实生动，性格突出。他家境较好，在上海有商号，有钱庄。早期受“三民主义”影响，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作品借他人之口说他“为了闹革命，学也不上了，商号经理也不当了，跑回厦门一心搞游行，搞革命宣传”。到上海后，跟随著名革命家沈漫云，更加热衷于革命活动。辛亥革命胜利后，庄希泉受沈漫云的委派，到南洋利用自己家族的人脉关系，创办中华国货公司，一边做生意，一边为革命筹集资金。在那里，认识了爱国侨领陈嘉庚。两人一见如故。陈先生不仅积极为革命捐款，而且与庄希泉交流了启迪心智、助于革命、助于救国的办学思想，认为教育是千秋万代的事业，是提高国民水平的根本措施，不管什么时候都需要。庄希泉深受启发，也认识到教育救国的重要性。不久后，他认识了女子教育专家余佩皋，一起投身教育救国事业。两人回到祖国，在闽南办基础教育期间产生感情，结为夫妻。在共产党员余佩皋的影响下，庄希泉信仰马克思主义，投身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在妻子病亡后，庄希泉经受了严酷的革命斗争考验，与儿子庄炎林先后入党，成长为坚强的革命者。

作品还写了一大批闽南籍华侨的优秀儿女。其中，叶飞、李林、莫耶的故事，给人印象鲜明深刻。叶飞后来成为新四军和人民解放军的重要将领，新中国成立以后，成为国家领导人，为人民军队建设和国家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李林则是受中共中央委派，到山西抗日前线工作，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出身闽南大户侨家的莫耶，成为优秀作家后，为追求光明，奔赴抗日圣地延安，在延安火热生活感召下，写出了《延安颂》的歌词。该作由郑律成谱曲，成为一首革命文艺史上不朽的作品。新中国成立初期，她受到不公的待遇，但她仍然相信党，相信国家，直到文革后，才彻底平反。

《时代荣光——闽南红色风华录》讲述闽南籍爱国华侨们可歌可泣的故事，描写了他们对闽南这片贫瘠土地的深情，描写了他们给这片苦难土地的回乡，描写了他们心中永远的强国之梦。这是从这里走向南洋的每一个华侨共同的传统乡愁。在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这种乡愁渐渐注入了一种进步思想和先进的文化，提升为忧国忧民的情怀，改变国家百年来受帝国主义列强欺负的灾难深重的命运，开启了闽南爱国华侨参与人民解放、民族复兴事业的伟大历史进程。也就是说，华侨的乡情乡愁正在融入时代的先进思想、红色基因之中，成为中国红色基因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陈嘉庚、庄希泉、叶飞、李林、莫耶等一代华侨，正好处于这样一个时代，作品写出他们的乡愁情感，更写出了他们政治思想的不断进步提高，投身时代洪流，投身民族解放事业的精神品质，表现了他们所具有的现实力量和时代精神高度。

回顾党的百年历史，不难注意到一个基本规律：所有进步的中国的仁人志士都是爱国者。国家民族的积贫积弱，人民生活的水深火热，使他们不得不思考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从那里找到民族的进步、国家的强大的秘诀。经过艰难探索，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终于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标志着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开始走上一条自由解放的光明之路。而早期的共产党人也都是从忧患国家民族前途命运走向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基本规律告诉我们，革命者，必须首先有家国情怀；只有爱国，才能救国。

从这个思想层面上解读《时代荣光——闽南红色风华录》，就能看出作品主题所反映的闽南爱国华侨的家国情怀向革命精神的提升过程，就是红色基因形成的历史。在爱国主义肥沃的土壤里，红色基因得以孕育，变成革命的种子，破土发芽，开花结果、长成大树。作品中写到的叶飞、李林、莫耶等新一代爱国华侨，正是由传统的家国情怀、爱国主义培育出来，最后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坚定的共产党人。由此可见，一代又一代爱国华侨的爱国主义精神，正是闽南红色基因形成不可或缺的精神文化财富。可以说，南洋的爱国华侨所创造的“时代荣光”，为闽南红色文化所做的贡献，再高的评价都不为过。作品能揭示出这种深刻的关系，主题思想也就更有新意，更加深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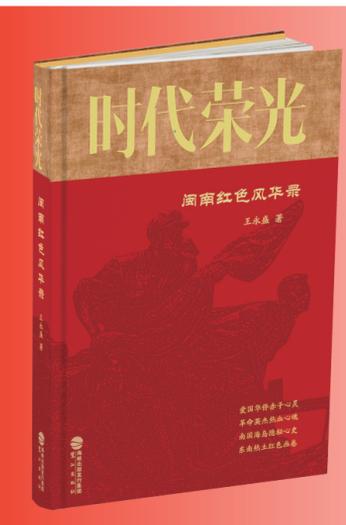
作品叙述明快，语言朴实，是华侨题材小说创作的力作。写法虽通俗易懂，却能引发我们的深思。今天，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不可逆转。我们更要赓续红色基因，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才能在世界风云变幻的时代，守望我们的初心，坚持我们的使命。从这个意义上说，《时代荣光——闽南红色风华录》所讴歌的爱国华侨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

部更显丰满和突出。而从这一角度看，应该说作者多少是有些拘谨，错失了若干完全有可能让作品增辉的机遇，多少有些令人遗憾。

《时代荣光》之“光源”基本来源于群像。具体地说，陈嘉庚、庄希泉、李林、莫耶……这些爱国侨领、革命英才的光辉形象在作品中的呈现虽有详略之别，但总体上则是共同置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中闽东南地区的红色画卷之上。作者在广泛研读史料、深入挖掘史实的基础上，以开阔的视野、细腻笔触以及富于地方特色的语言，展示出一特定时空中的一大批具有革命理想和情怀的闽南先贤舍家业、倾家财、献青春、洒热血的鲜活言行，一幅以闽南风土人情及独具特色的侨乡文化为轴心，并合逻辑地辐射到相关区域的长卷得以徐徐展开：从立足闽南金三角辐射到港台及内地，从立足东南亚适度延伸到更广阔区域，从清王朝的崩溃到新中国成立前，在这样一个广阔的太空中，作者善于在共性中突显个性、以个性点染铺就其共性。特定时代——从晚清到新中国成立前，特定区域——以闽南侨乡为轴心展开，彼时彼地的民间疾苦、风土人情和时事风云是共性，在这个环节，作者对彼时彼地的书写充分发挥与调动了小说这一虚构性文体的特色功能，着墨虽不多，但点染开来，一个特定的时代与区域还是

十分形象与个性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而在这个特定的太空中扮演主角者则是以几位真实的侨领为轴心展开，他们及他们身边至爱亲朋的奋斗与生活历程皆建立在真实的史实基础之上，这是共性；而截取他们人生历程中最具特色、最有个性的几个片段展开文笔式的刻画则是在共性中突显个性。诸如陈嘉庚先生生性沉稳、善经营、重教育；庄希泉先生有激情、善组织……凡此种种，皆显示了这一特定人群中不可复制的独特个性。正是这种有选择、有意识的共性与个性相结合，写实与虚构相映衬，使得《时代荣光》散发出绚烂的“光谱”，吸引读者领略闽南红色画卷背后的上下求索、无私奉献和伟大荣光。

作为本文结束还想说一点的是，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的大庆日子里，作为党成立之初星火闪烁的闽南三角洲，地处于斯的海峡出版发行集团所属之鹭江出版社推出这部名为《时代荣光——闽南红色风华录》的长篇小说当是一次颇有见识的作为。这样一种“红色侨乡”文化之于他们虽未必具有绝对的独占性，但得风气之先则毋庸置疑。怎样用好用足用活？对一家资源相对有所局限的地方出版社做好主题出版工作无疑还是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时代荣光——闽南红色风华录》的出版所获得的好评已然证明了这一点。



王永盛长篇小说《时代荣光——闽南红色风华录》评论

□李蔚超

创造穿梭可入的红色历史

不妨将这部书看成一幅故纸斑驳却清晰可辨的二维地图。闽南(厦门、漳州、泉州)位于地图的中心，如同数码时代我们脑海里、记忆里的电影、纪录片、数码图片、电子游戏一样，一道道鲜红的、闪光的箭头指向并连接起一座座城市和历史空间。与其说作者王永盛是这幅地图的绘制者，不如说为中华崛起而奋斗不息的中国人创造了波澜壮阔的历史图景。在一百余年后，作家王永盛用文学的方式画出了红色箭头的指向，曾经见证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城市逐渐在地图中浮现、拉近、放大，最终使我们穿梭可入——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时的北平，中国共产党成立所在的嘉兴南湖，五卅惨案中的上海，被日军奴役践踏的东北，中共领导下的革命圣地延安。不仅中国，地图以闽南为出发点，向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地伸展。在地图上，在历史空间中，在百年前的华夏和南洋的大地上，一时英杰，风华茂盛，为了民族复兴的伟业矢志不渝地奋斗着。文学作品让今天的读者再次获得了走近他们、追随他们的机会和可能。

王永盛是一位擅长创作纪实文学的作家，在描写事关民族重大时刻的场景、故事、行动时，他放弃了小说虚构的特权，秉笔直书，还原史实，与此同时，他将小说的技法用于虚构人物在特定情境下的对话、心理的合理想象，以求更加逼真地回溯历史，增加人物的可知可感。我同意作家苏宁对王永盛和这部作品的评价：“这样的写作，需要严谨的文献梳理作支撑，还要有开放的视野与对素材的考量。虽然是小说，但却不能对人物、事件有任何虚加，哪怕为了人物的立体与丰富。关于这一点，仅能由人物自身实存的立体与丰富实现。这个过程是披沙沥金。因而，写作难度要高于以虚拟人物为主人公的写作。”

陈嘉庚是厦门集美人的骄傲，也是闽南红色传统的开创者，一部闽南红色风华录理当从他开始，陈嘉庚的传记、记述并不罕见，书写历史上的英雄才杰有很多路径，或以成长故事叙述其个人经历与时代大历史的关联，或为超人式的英雄填充“人性”的骨内。南洋闽南风云舒卷，故事千头万绪，为了完成“记之具”的录的写作，王永盛必须把握住主要人物陈嘉庚。《时代荣光》在正面书写陈嘉庚的品质和才干时，作者格外突出其行为为天下先的先行者的形象，从而实现了对一个人、一群人、一代人的风华的追慕与记录。在厦门大学的筹建和发展历程中，第二任校长林文庆是陈嘉庚由南洋以殷切的诚意邀请归国，为请回林大学，陈嘉庚曾致书孙中山，毫不客气地直述办学之重要性，让孙中山高明任民国外交部部长。林文庆在接受陈嘉庚的请求时就表达了对陈嘉庚先生倾其所有办学的感佩，立志追其步伐。书中展示了陈嘉庚的远见卓识，他不仅率先看到了落后于现代进程的中国“穷困”之弊端，“国家之所以富强，非由于政府，乃由于全体人民。中国欲富强，欲教育发达，何独不然”，于是兴办教育，开创厦门大学 and 集美学校；而且，他清醒地洞察到了南洋华侨“富甲一方”后之弊端，“华侨多不愿回国，虽有回国者，亦不过捐巨资作安逸之富家翁，沉迷于种种奢华。在福建曾见华侨嫁女，乃费千万之多，实为奢华之极；而对于实业教育各问题，反置之不问”。陈嘉庚斥言“长此以往，华侨财富愈富，愈有害于中国”，行为世范身先作则，集美学校成为中国、东南亚自办教育的典范乃至奇迹，陈嘉庚不仅“使南方有中国自办之最高学府”，他开风气之先，直至20世纪80年代，南洋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创办可以说继承了陈嘉庚精神和意志。当然，陈嘉庚对中国未来的准确预见表现在他的延安之行，并据此寓言延安代表着中国的未来和希望。

凡历史题材的写作，无论小说还是纪实文学，钩沉史海是作家必要的案头工作，还原历史场景是作家写作的重要任务，在《时代荣光》中，王永盛将更多的心血放在梳理勾连闽南先贤之间的关系，从而描绘一部闽南群英谱，他的选择，不是书写一个人的传记故事，而是记录一群人、一代人。诚如书中所言，“20世纪初期，一粒又一粒革命种子悄然种下，在闽南，在福建，在中国，在世界各地。”中国内部的空间差异显然十分复杂，更不必提南洋乃至世界的具体差别，然而，为了突出红色历史的主线，王永盛将时代演进与空间同质建立联系，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革命为主线，在一种必然历史展开的进程中理解、选择人物和故事。为了以文学的方式创造历史“元宇宙”，让百年之内的读者身临其境地体会到一代又一代的革命壮士为民族复兴伟业的实现而接续奋进，作家尽可能将闽南革命者的行动与全国革命关联，与20世纪重大的历史事件建立联系。《延安颂》的作者莫耶的父亲是革命勇士陈铮，陈铮的父亲是爱国华侨建筑师陈纲尚，当讲述陈纲尚回乡建筑“逸楼”时，王永盛便向读者透露了陈氏家族继承爱国基因的人物脉络。《百年孤独》式的时间颠倒的开头也作为作家借鉴的对象——“在此后半多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叶启亨将在中国革命史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他后来的名字叫叶飞”。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举国上下学习百年党史，是为了动员共产党人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新时代书写红色历史的文学作品的责任就是建立起红色基因传承的脉络，用人物和历史自身的逻辑回答一代一代的革命先人用青春、智慧、生命接续奋斗的志向是什么，他们在中华民族最危难之际如何及为何探索、迷惘并坚定地抉择。如今，面对这部《时代荣光》，至少可以说，在创作过程中，王永盛并未有一刻忘记了他的使命。

王永盛长篇小说《时代荣光——闽南红色风华录》或许可视为一部历史小说。因为它所叙述的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些人与事。

作为一部关于东南亚华侨革命事迹的作品，《时代荣光》的题材给读者以一种新鲜感。新鲜，当然是因为这一题材作品比较少见，但不是前所未有的。事实上，像上个世纪40年代出版的司马文森长篇小说《南洋淘金记》、80年代出版的杜埃长篇小说《风雨太平洋》就是反映南洋华侨革命和抗日斗争的经典之作。然而，《时代荣光》这部作品有其独特的视角，它主要是叙写南洋华侨陈嘉庚等几个代表人物跨海内外的的事迹经历，尤其是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支持襄助乃至虔诚信仰和亲身投入。小说倾力描绘了20世纪的红色风华里他们的音容和身影。

选择了这样一个题材，作者先要解决的应该是文体的问题。作为叙事作品，这一题材可以写成完全纪实的即所谓纪实文学或非虚构作品，也可以写成完全虚构的小说。但我觉得作者有一种叙述历史、铭记历史而又生动地显现历史的雄心抱负，因而要从题材中“突围”。一是要从已有的前人作品中突围。除了前文提及的《南洋淘金记》和《风雨太平洋》，关于陈嘉庚的传记、回忆录以及影视作品就已有多种。二是要从文体中突围。在有着诸多真人真事、人物原型的前提下，文体的选择的确令人踌躇。作者最终找到了现在这样的文体：长篇纪实小说或曰纪实性长篇小说。纪实，是因为作品中的主要人物是真实存在，主要事迹亦真实不虚。小说，是因为作品的情节、细节、对话和心理活动等等大体是虚构的。要生动地再现和表现这段历史，让这段历史“活”起来，我认为作者对文体的选择是适当的。

这部作品着力描写和刻画的主人公陈嘉庚，是中国现代史的传奇人物。陈嘉庚17岁从福建到新加坡随父经商，聪慧灵敏而又脚踏实地、诚信坚毅，使他在商场上迅速成长，崛起为华侨工商巨子。他念念不忘积贫积弱的祖国，身处海外亦思尽“国民一分子之天职”，大力兴学，创办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抗战期间，广泛动员海外华侨支援祖国，并率南洋华侨代表回国慰劳考察，轰动国内外。对新中国的建设，陈嘉庚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陈嘉庚是爱国华侨领袖、企业家、教育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也曾担任全国侨联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陈嘉庚生平事略有诸多资料包括文艺作品可查考，但作为小说主人公，还是有一定难度，一是人物经历复杂，二是人物身份崇高。作品紧扣陈嘉庚早年的生活经历包括他在中国命运转折的关头，比如辛亥革命、抗日战争期间的重庆和延安之行，所作出的重大选择。作品更聚焦他倾资办学的事迹，并通过主人公与各界人物的过从交往，突出他对祖国的卓越贡献和对身边周围人物追求革命与进步的巨大影响，亦注意表现他在日常生活中普通人的一面，人物塑造粗细有度、繁简得当，因而主人公形象和性格皆达到立体生动，令读者印象深刻。

历史是人创造的，历史是人的历史，对历史的记述，亦即是对人的书写。小说叙写了庄希泉、余佩皋、叶飞、莫耶、李林等新一代华侨和华侨子女最终走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道路，他们或者直接得到陈嘉庚的帮助，或者受到陈嘉庚事迹和人格的感召。庄希泉和余佩皋分别在加坡和台湾进行了与英国和日本殖民者的坚决斗争，两人最后结为伴侣。叶飞、莫耶和李林都是华侨后代，叶飞中学毕业即放弃升学，脱离父母、脱离家庭投入革命地下工作。莫耶与父亲决裂，追求革命和进步，奔赴延安进入抗大，并与郑律成合作创作出传遍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歌曲《延安颂》。李林更是生就巾帼不让须眉的泼辣性格，投身革命队伍后积极请缨上战场杀敌，最终怀着身孕牺牲在与日本侵略者的鏖战中。这几个性格各异而又独特鲜明的人物形象，使华侨的现代革命传奇增添了新的内容与色彩。

作品还涉及对现代史上真实人物的评价。比如，关于厦门大学第二任校长林文庆的历史评价问题。在一些文章中，林文庆是颇为负面的人物，一是因为他在担任厦大校长期间对鲁迅的打击和排斥；二是1942年日军占领新加坡，林文庆被日军抓进集中营，在新加坡沦陷期间担任日本驻新加坡总领事馆新闻官的筱崎的劝说下，林文庆出任了华侨协会会长。虽然他曾利用这一身份掩护，解救了不少爱国华侨，二战结束后也没有受到任何追究，但还是被一些人诟病。王永盛这部小说通过陈嘉庚的视角，展现了对林文庆这一人物的更为全面的审视。在小说中，曾与林文庆有过不快的庄希泉不理解陈嘉庚为何聘林文庆为厦大校长。陈嘉庚说：“接到我的邀请后，他马上放弃新加坡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举家归国，且不愿我半分薪水。你不认为，此情诚可感人？”“后来我才知道，他同时收到两封电报，一封是孙中山请他担任外交部部长，另一封是我请他任厦门大学校长，他无怨无悔地选择了后者。你们都是我的好友，希望彼此放下成见，以大局为重。人活着，总是要向前看的！”“林文庆在南洋之事业，如数十万元之家产，与其儿几大元之主席，按年酬金以万数，但他为了厦大，将其全部放弃。此等情谊，让我感佩！”作者也直接对林文庆进行评价：“其实，不仅庄希泉不喜欢林文庆，在厦门大学，林文庆曾长期被贴上保守、僵化、反动等标签。后人也因此忽略了他这位教育曾经的奋斗与奉献，但实际上，林文庆没有辜负陈嘉庚先生的厚望。从1921年到1937年，在担任校长的16年间，他兢兢业业，呕心沥血，让一座堪称中国东南最美丽的大学出现在厦门岛一侧的山风海涛之间。”对林文庆这一历史人物的再认识，也是读者阅读这部小说的一个收获。

小说以真人真事并以真实姓名进行创作，虽然其来有自，在文学史上也不少见，但其中得失尤其是在小说本体论和小说美学上的意义，我认为仍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课题，《时代荣光》在这个意义上提供了又一个值得讨论的文本。

让历史活在纪实与虚构之间

□石一宁